



# 雨涼涼

[苏] 帕乌尔·库乌斯别尔戈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雨 漫 漫

КАПЛИ ДОЖДЯ

【苏】帕·库乌斯别尔戈 著

张根成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ПАУЛЬ КУУСБЕРГ  
КАПЛИ ДОЖДЯ

据苏联《小说报》1978年第8期译出

〔苏〕雨潇潇

张根成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插页2字数180,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册

书号：10100·631 定价：0.65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 主要人物表

- 安德烈阿斯·雅尔拉克（小名阿特斯）——前鲁伊克韦列乡党的组长，汽车场人事处长兼党的组长，建筑处砌炉工，梗塞病患者
- 艾杜阿尔德·特努皮亚尔特（小名艾特斯）——长途汽车运输站司机，安德烈阿斯童年时的朋友，后来的仇人，梗塞病患者
- 塔阿韦特·托姆松——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安德烈阿斯童年时的朋友
- 雅阿克·诺奥特马——医学博士，安德烈阿斯童年时的朋友
- 卡阿琳·特努皮亚尔特——艾杜阿尔德的妹妹，安德烈阿斯最初的恋人，雅阿克·诺奥特马的妻子
- 尼古拉·库尔维茨——集体农庄庄员，安德烈阿斯的熟人
- 玛丽耶特塔——尼古拉·库尔维茨的妻子
- 艾拉——医院卫生员
- 伦特谢尔——医院的老大夫
- 玛尔季特·沃奥列坎德——纺织工业部工程师，经济学家，安德烈阿斯的情妇
- 纳伊玛——食品托拉斯会计，安德烈阿斯的妻子
- 安德莱斯·雅尔拉克——安德烈阿斯的儿子，小流氓
- 尤莱·雅尔拉克——安德烈阿斯的女儿，纺织工业部工作人员，塔阿韦特的情人

## 前　　言

《雨潇潇》一九七八年刊载于苏联《小说报》，是苏联爱沙尼亚著名作家帕乌尔·库乌斯别尔戈的一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比较好的作品，曾获爱沙尼亚共和国奖。

作者在书中以娴熟细腻的工笔，首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感人肺腑的光辉形象——共产党员安德烈阿斯。安德烈阿斯有坚强的信念，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在卫国战争中，他是祖国九死一生的保卫者；在经济建设时期，他是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的建设者。然而安德烈阿斯的遭遇却很悲惨，妻子与他离了婚，儿子成了流氓，女儿的前程面临着威胁。但是，他并不为个人的不幸感到惋惜，一心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由于积劳成疾，他患了心肌梗塞，但他没有因此就退出战斗岗位。作者对安德烈阿斯的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同情，热情地讴歌了他的高尚的情操和纯洁的灵魂。

书中着重刻画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物，一个是副部长塔阿韦特，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分子艾杜阿尔德。两个人都是安德烈阿斯孩提时代的朋友，但他们的处事态度不同，遭遇也各异。塔阿韦特虽然官高位显，但他品德低下，名不副实。他只是由于善于趋炎附势、拍马逢迎，才平步青云，攀上副部长的高位。尽管塔阿韦特职务很高，但他的灵魂却十分丑恶。安德烈阿斯与他相比，简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艾杜阿尔德是安德烈阿斯儿时朋友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他的思想比较保守，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投降了德国人，做了可耻的叛

徒。艾杜阿尔德一直顽固不化地循着自己选定的道路走着，到头来碰得头破血流。二十五年之后，当他因患心肌梗塞和安德烈阿斯在医院的病床上再次相逢的时候，他痛心地向安德烈阿斯供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过。

作者正是通过这两个人来衬托安德烈阿斯的高尚情操。至于说造成品德高尚者不得志，而趋炎附势者则青云直上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这是作者不敢触及之处，细心的读者不难体察。

所以说，阅读《雨潇潇》不仅可以给我们以饶有趣味的艺术享受，而且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中难免会出现缺点错误，还望广大读者赐予批评指正。

## 译 者

# 1

安德烈阿斯·雅尔拉克究竟躺了多久，三天、四天，还是五天，他自己也说不准，也许有一个星期了。他不曾计算天数，时间对他来说就象是停止了一样。他可是个有名闲不住的人，没有虚度光阴的习惯。安德烈阿斯十分清楚，他需要躺很久，起码一个月，说不定还要多。他曾听汽车场总工程师说过，他也曾这么闲躺了四个来月。这些话如今忽然浮上了安德烈阿斯的脑海。可是他自己被困倒在床上多久了，安德烈阿斯·雅尔拉克却不曾想过。没有问过医生，也没有打扰过护士：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许多问题都退隐开去，退到了迷茫的远方，似乎他跟这些问题已毫无关系，可是仅在几天前这些问题还搅得他坐卧不安呢。他甚至连儿子的事都回想不起来了。每当想起他时，思绪又转到别的什么事上去了，而这想法又是那样微弱，就好象根本不是他的，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难道一个人真的会如此强烈地被疾病压倒，以致一旦染上了沉疴，什么事情都立即忘却了吗？但是，安德烈阿斯没有为自己的病感到不安，他对个人的命运不大在乎。萦绕在脑海的是：打针、吃药的麻木状态何时得以解除。没有一天不打针，天天都要吃很多很多的药。早晨打针，晚上打针，为的是防止心肌梗塞再次发作，为的是胸腔里不再象被烧红的老虎钳夹着那样灼痛。打针，吃药，为的是不使那恐惧，那吓人的恐惧重新占据他的心。在家里，他经受了从来不曾经受

过的恐惧。诚然，在战争年代和战后，他也经受过某种恐惧，可与现在这种撕裂人心的恐惧，却是截然不同。在战场上，它来得更象打寒噤，或象是一种担忧：机关枪的扫射可能把他撂倒，弹片也可能击中他。在这种情况下，眼睛马上就会发现可以隐身的洼地或弹坑。只要他和其他人一起冲锋，恐惧仿佛退隐开去，潜伏了起来，代之而来的是激奋，是昂扬的斗志，甚至是好斗的狂热。即使负了伤，挂了彩，他也毫不畏惧，甚至在脑际还会闪现出某种欢快之情，庆幸心尚留在体内。过后才醒悟过来：他可能流了很多血，因为弹片打断了大腿上的动脉。连队的卫生员阿布拉姆·布鲁明费尔德救了他的命。卫生员身材敦实，体格粗壮，一对眼珠向外凸出着。大伙都管他叫洋铁匠卡尔：他父亲在佩尔吉林纳开了爿小店铺，收的唯一徒弟，就是小儿子阿布拉姆。起初，战士们颇觉扫兴，连队卫生员怎么不委派个爱沙尼亚人呢！但是，经过几次战斗大伙方才明白，算他们走运了。洋铁匠卡尔几乎是全连最勇敢的人。他总是待在前沿阵地上，哪里最需要救护，这位暴眼突睛的卫生员便意外地出现在那里。阿布拉姆撕开安德烈阿斯浸透鲜血的棉裤，把止血绷带扎在鲜血直淌的大腿动脉血管上。在野战医院里，人们对阿布拉姆扎绷带的技巧赞叹不已。绷带救了安德烈阿斯的命。

阿布拉姆本人却不走运，战争结束的前四天，他在库尔良基被打成了残废。一天，阿布拉姆沿着一条小道到卫生连去领漂白粉，不知从哪儿飞来的流弹在他身旁爆炸了。每当安德烈阿斯谈起过去的战争，总要提到阿布拉姆，称他是最最勇敢的人。阿布拉姆也知道恐惧，他本人就曾向安德烈阿斯坦率地承认过。然而，阿布拉姆总是战胜了它，他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一

个连队卫生员所必须做的。

真正使安德烈阿斯受到惊吓的，是战后第二个和平年向他射来的子弹。一天破晓时分，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子弹嗖嗖地打在墙上。幸亏出事的前两天，他把那张嘎吱嘎吱响的旧木板床从火炉边移开了，因为他不喜欢睡在太暖和的地方。原先靠床的那面墙布满了弹痕：匪徒们显然窥探到了乡党小组长在屋里是靠哪面墙睡觉的。那次恐惧如同用一只手指住了他的咽喉，使他浑身麻木，几乎惊呆了。安德烈阿斯记不清他后来是怎样清醒过来的。当匪徒企图破门而入的时候，他已将冲锋枪的枪托顶住肩膀，俯卧在地上了。他对准门的手处，嘟嘟地射出了几颗子弹。一个匪徒被打伤了，在门外的小台阶上和土豆田边那条通向丛林的小道上留下了血迹，但还是窜进灌木丛逃掉了。从留下的脚印看，他们总共只有两个人，看样子，并不是十分有经验的匪徒，不属于那些经历过多次围剿、干过敌伪警察营队，并有着每年一次奔袭农村积极分子经验的暴徒。有经验的“绿林好汉”不会莽撞地用枪托砸门，他们会朝另一扇窗口扫射，会想方设法摸清里面的动静。

也许这帮人并不是真正的匪徒，战争中散失在农村的枪枝是很多的。他，安德烈阿斯就曾在一个被废弃的田庄的顶棚上，捡到了一挺带弹盘的冲锋枪和一顶盛满子弹的头盔。再不就是，怙恶不悛的豺狼派那些刚入伙的冒失小伙子来学习本领，得到锻炼。唔，当然啦，也很可能是为了把那些一时糊涂误入绿林的庄稼汉更紧地拴在那里，以便把他们想回家的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也不能完全排除农村那些嫉妒的毛小子、愣头青向他报复。邮局女职员艾达有很多垂青者呢。有一次，太阳快落山时，他穿越牧场急匆匆地回家，正打邮局门口经过，

身后就传来了恫吓声。想到大伙都认为他是艾达的情人，直令安德烈阿斯觉得好笑。他刚从乡执委主席那儿来，他们就集体农庄问题争吵了一个通宵。不管是谁打的枪，那天夜里他可是遭到了危险，恐惧顿时攫住了他。

现在他对恐惧的感觉体验得更为深刻，深入到了心灵的最深处。诚然，恐惧感并没有掐住他的咽喉，没有使肌肉筛糠似的抽疼，但却完全控制了他。恐惧感笼罩了他的全身心，有时它似乎在渐渐减弱，但很快又加剧起来。这是对死亡的恐惧啊，恰恰是死亡。尽管胸中的疼痛在向其他部位扩散开去，甚至有点儿减轻，但疼痛终归在他自己身上。

安德烈阿斯觉得打针吃药还是起作用的。病不再发作了，他把这归功于医疗，归功于他那漫透身心的淡漠态度。人们强制着他吞药片，给他灌药水，将接在氧气袋软管上的细管子插进他的嘴里。安德烈阿斯最初几天似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愿望。别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好象丢了魂似的。他十分贪睡，有时觉得自己似乎不存在了，不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好象这发生在很早以前，又离这儿很远很远……

安德烈阿斯很少有自我感觉良好或接近良好的时刻。在这种时候，他觉得麻醉剂、马里胡阿 纳<sup>①</sup>，或者 ЛСД<sup>②</sup>的服用，大约都使他有不问世事这样的感觉。打针和吃药仿佛把他带进了另一个世界，抑制了疼痛，驱散了忧虑。不，他搞错了吧！据说，麻醉剂可以使人镇静，使人兴奋，至少有人是这么写

---

① 马里胡阿纳：印度大麻中所含的麻醉性毒。

② ЛСД：检疫新药。

的。

他不由得想起了以前在学习班上的一次争吵。他申述说，我们不仅经常而且十分响亮地谈论什么西方的麻醉剂，可是当问题牵涉到酒精的时候，我们却不吭不哈了。这下可把一位素享盛名的讲师惹恼了。结果争吵了一场，若不是那位有点名气的演讲人在同市委书记的谈话中对安德烈阿斯政治上是否成熟和他是否适应在大教室的讲堂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怀疑，他也就不会再想到这位讲师了。那一次，安德烈阿斯大发雷霆，把讲师狠狠斥责了一通。幸而，他想起了列宁的教导：须知，只有经典著作里的精辟论断才能浇灭这些具有超级警惕性的同志的火气。

安德烈阿斯·雅尔拉克乘公共汽车时，第一次感到胸口堵得慌。他以为这是由于路上颠簸得太厉害，而且车上又挤得水泄不通的缘故。他用左胳膊顶住窗框，支撑住身子，否则他就会被挤得倒在一位谈笑风生的胖女人身上了。胖女人正拿着一本新出版的《爱沙尼亚风光》杂志扇着。突发的疼痛从胸膛里蹿出来，扩散到他用以支撑身子的左胳膊，他觉得手不自然地猛然抽动了一下。公共汽车在此之前剧烈地颠簸了一下，乘客们你跌我撞，互相磕碰，车前轮象是撞到沟坎上了。

汽车里空气窒闷。炎炎烈日把车身晒得滚烫，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儿钻进了车厢。

“快打开车窗啊！”前面响起了女人绝望的叫喊。

两边的车窗一下子全都打开了，不过还是不见凉爽。

一个十三四岁、面黄肌瘦的男孩，不时地踩到他的脚上，而每次都表示歉意。这会儿，男孩的脖颈都因充血而变红了。

安德烈阿斯没有生他的气。孩子的身子被挤得直向座位上倾倒，不知谁的包着尖锐金属角的纸板手提箱顶在他的膝盖上。

安德烈阿斯起初是坐着的，可是，当妇女们由于炎热和窒闷被弄得精疲力竭，用一双双痛苦难熬的眼睛望着你的时候，你能坐得住吗？你好意思瞪大眼睛泰然自若地眺望窗外吗？尽管他也清楚，站在过道上的妇女早已不用责备的眼光注视坐着的男人了；对于男同志不让座她们已习以为常。他还是站起身来，把座位让给了那位憋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停地扇着杂志、谈笑风生的女人。

安德烈阿斯暗自诅咒公共汽车场的领导。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经济指标，竟让公共汽车超载行驶，不另增派车辆。他还责备自己怎么会想起作这次旅行的。他没有向玛尔季特作出任何肯定的承诺，他寻思着，一般说来他应当同她断绝往来。

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年轻人也将身子靠在两扇车窗之间的空壁上，用空着的一只手拿着德文杂志，倔强地看着。门旁被挤得缩成一团的三个女孩子总在哧哧地发笑。这些细枝末节都深深地印入他的记忆中，仿佛搭乘公共汽车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事儿。

赶到汽车稍微一刹车，站着的乘客便彼此向对方倾倒。安德烈阿斯似乎觉得，他掉进了一个庞大的、飞速旋转着的搅乳器里。

天气炎热，人人汗水直淌，脸上都挂着痛苦的表情。他所扮演的大概就是祭坛前无辜羔羊的角色。唯独谈笑风生的女人，虽说她已犹如被抛上岸边的鱼儿那样张大着嘴巴，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可嘴角仍然漾着微笑。

安德烈阿斯不止一次地追忆起那次乘坐公共汽车的情景。谈笑风生的胖女人，欢笑着的姑娘，倔强地读着杂志的青年，男孩的紫红脖颈以及乘客受折磨的脸孔，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当时并没有留心观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他不满意自己，不满意刚刚结束的青年夏令营的座谈会。由于时间的关系，夏令营的领导不停地向他打手势——短点吧，短点。

座谈会拖长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他为能引起青年听众的兴趣感到高兴。他谈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讲到了战争。正是战争迫使他和许多同他一样的中学毕业生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扛起了枪杆。他叙述了最初的一些战役，没有忘记讲阿布拉姆·布鲁明费尔德的事迹，叙述了战争期间象他一样的年轻人都在想些什么，是什么赋予了他们战胜一切的力量，他和他的同龄人都有哪些理想，等等。他刚要结束谈话时，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您当时向往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提这个问题的是位十六七岁的年轻小伙子，他的音容笑貌中洋溢着稚气的坦率和诚挚。他应该以同样的坦率来回答这种诚挚的提问。安德烈阿斯从自己历时较久的演说实践中深深地知道，只有演说者赢得了听众的信任，他的话才会为听众所接受。如果听众怀疑演说者的坦荡胸怀，如果他们认为他是位言不由衷、人云亦云的人，那么尽管话说得娓娓动听，但归根到底还是言之无物、空洞贫乏的奢谈。

提出的问题使他异常激动，他一时甚至找不出恰当的话来回答。可以把话题岔开——难道他不也曾这样做过，因此绕开了锐利的锋芒吗？但这年轻小伙子极易轻信他人，绝不能泛

泛而谈，敷衍塞责。要他回答的是“是”与“否”，他没有权利回避问题的锋芒。加之，这位留着鬈曲长发、穿件方格布翻领衬衣的小伙子正拿眼睛瞅着他呢。年轻人养成了一种敏锐的嗅觉，他们直觉地猜测到是在跟谁打交道。是啊，其他人也都支棱起了耳朵，教室里的人很少会处在这么协同一致的期待中。平时，如果讲不出更新鲜的道道，他总是尽力吸引听众的注意，他手头备有很多引人入胜的奇闻趣事。但是，教室里这种屏声静息、聚精会神地期待他回答问题的场面却异常少见。何况，时间早就超过了，夏令营的领导又不耐烦地多次看表暗示。于是，安德烈阿斯说，在青年时代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人，是纯洁无私、热爱劳动的人和聪明人的世界。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能还存在贪污、盗窃、谋财害命、自私自利、野心钻营、敲诈勒索等现象，他当时，在他二十岁当战士的年代，是想也没有想过的。这时，夏令营的领导再也没有耐性了。他利用短暂的停顿，急忙向安德烈阿斯道谢，长时间地向他鼓掌。但是他觉得谈话不应该就此结束，他一定得告诉他们：他们大家，尤其是青年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善良、纯洁而无私的人的世界。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自己回避了正面答复。这使他内心很不安：安德烈阿斯翻来覆去地思索着，身上的汗水象断线珍珠似的直往下淌。就在他沉思默想自我责备的当儿，胸口突然觉得憋闷，呼吸也急促起来。

可以想象，他面色一定很苍白，因为那位又高又胖的女人正凝视着他，出乎意料地建议他坐下。

只有一刹那的工夫，一切都过去了。

是否那次旅行和当时他想到的那件事现在又一齐闯入了

他的记忆呢？因为第一次发病就在公共汽车上啊！当时他没弄清，也丝毫没有想到这就是发病，丝毫没有想到它可能引起冠状血管痉挛。

以前心脏没有什么病。虽然，他头疼过，且疼得很厉害，但症状并不是这样，全然是另一种样子。

虽说有一次，那是在二十多年以前，当他飞跑回家，发现父亲躺在一堆废砖中的血泊里，他曾感觉到心脏憋气，憋得直发疼。听见枪声，安德烈阿斯迅即想到了最可怕的事，但在他向自己简陋的小屋奔跑时，他还希望他错了，希望父亲不在家，尽管他也知道，父亲说过天亮前来砌炉子，否则天黑前他们家就暖和不了。但由不幸引起的痉挛，毕竟不是心脏病发作啊。

浮上记忆的还有玛尔季特以及他俩之间的一些事。然而公共汽车之行和青年夏令营讲演的情景总在他脑子里转悠。也许是因为打针吃药使脑神经麻醉，大脑的正常功能遭到了破坏，似乎他的思维在不受控制地转动，平常指导思维活动的意志力消失了。

当安德烈阿斯跟玛尔季特呆在一起时，他感觉到心脏紧缩起来……那是在畅游大海之后，在海滩上晒太阳之时。他俩在海里游得很远，几乎就要到海湾的中心水域了。他们一直肩并肩地游着。玛尔季特在水上滑游得轻捷迅速，显然以前跟教练学过游泳。安德烈阿斯也自认为是个满不错的游泳能手。

他在商业学校上学的时候，是个划船爱好者。体育老师曾一本正经地劝他参加训练，但安德烈阿斯所迷恋的却是截然

相反的东西。安德烈阿斯把在海上感到窒闷看成是常有的现象：田径运动员不是也经常感到气堵。诚然他没有跑步，然而游泳同样是很紧张的运动啊。他没有告诉玛尔季特，说他胸口感到刺痛，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很脆弱。她至少比他小十二岁。夜晚在家里，当胸口灼痛得厉害，当疼痛窜到左胳膊、肩膀和脖颈，当他已被恐惧所掌握的时候，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假使在海湾里突然发作起来，那将会怎样呢？这一假设不知怎么反而驱除了恐惧。归根结底，还算他走运呢。在海里情况要糟糕得多，百倍地糟糕。

碰上那个看急诊的医生也算是他运气好呢。起初，疼痛弄得他麻木了，医生的年轻使他很恼火。甚至于在想，刚刚从大学的长凳上下来的女娃娃是不应该在急诊室工作的。他以难以掩饰的嫌恶回答她的询问。女医生仔细听了他的心脏，接着在他的舌头底下压了一小片药，打了一针，然后急忙跑去不知给哪儿打电话喊专业医疗班来。她一直守候在安德烈阿斯身旁，直到医生和护士赶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大夫确诊为心肌梗塞。这一点医院已经告诉过他。在家里没有提到梗塞，只顾得上说需急速送医院治疗，家里不具备治疗这种病的条件，绝对不能拖延时间。所有这些，他都照办了。疼痛和恐惧迫使他象孩子般地听话。当时没有让安德烈阿斯自己挪动一步，大家用担架把他抬下了楼。这里的楼梯跟大多数旧木板房里的楼梯一样，既窄又陡。赶来帮忙的司机抱怨着阶梯，他的话如同透过棉花包那样模糊厚重，朦朦胧胧传进了安德烈阿斯的耳朵。第二个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疼痛渐渐消失了。在医院，疼痛再次发作，疼痛和缺氧又引起了他的恐惧。

过了六个小时，疼痛才渐渐消失。

第二天，当他彻底恢复了平静，那位年轻的急诊女大夫的美丽动人的形象又情不自禁地涌上他的记忆，他的双眸当时曾呆板地将这一切录入自己的脑海。他在忆及她的同时，还联想到人的大脑宛若一台电子计算机，负责储存万事万物，并把它们分别放入记忆的小孔。想到这里，安德烈阿斯顿时就又忘掉了女大夫，也忘掉了人的记忆乃是一种控制论装置。忘掉了，一股脑儿全都忘掉了。

卫生员艾拉跑来给他喂饭了。她把靠床放的搪瓷托盘移放在胸前，将一个带嘴的奇特陶瓷小盆儿——这玩意儿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凑到他嘴跟前，给他吃了点不知什么东西，也可能是清汤。安德烈阿斯本想坐起来，但卫生员不允许他这么做。

“你静静地躺着，别瞪眼呀，我称呼‘你’，怎么啦？有病的男人就好象是个小孩子，跟孩子讲话不就称呼你呗。”她唧唧咕咕地饶舌道，“你孤单单的一个人，要是有妻子的话，她就会陪坐在这儿啦，那就用不着我啦。她会给你喂饭，端着喂水盆儿给你喝水。最初几天，妻子一般都是呆在这儿的，就连平时那些跟男人闹别扭的人也都这样。梗塞甚至把那些最好吵闹的人都惩治得服服帖帖啦。还在门外边我就告诫那些娘儿们，不许刺激病人：病人气一上来，会咽喉堵塞，脸色发青，打针或者输氧能不能奏效还很难说呢。我劝那些男人们放聪明点，要明白事理，把那些骂爹骂娘、挥舞拳头的事儿往后放放。赶到病好有力气了，互相生闲气、找苦恼的时间多着哩。”

艾拉是位年近六旬的胖女人，象个小圆球似的在病房里